高教动态

2026 年第 8 期

杭州师范大学发规处（学科办）编　　2026 年 10 月 31 日

目录

【政策导向】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交流推进会召开 1

【政策解读】

◆国务院学位办负责人解读《关于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工作的意见》 6

【新闻短讯】

◆2026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 10

【高教动态】

◆以创新创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 12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省域实践 17

【学科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成立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启动 25

【常春藤高校】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培养模式的转型 30

【政策导向】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交流推进会召开

10月16日，教育部在京召开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交流推进会。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皓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加快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实施一年多来，有关部门密切协同，各地各高校积极行动，供需适配、超常布局等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学科专业结构持续优化，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和突出成效。

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和行动自觉，着力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改革攻坚，加强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的前瞻布局，增强供需适配的主动性；构建需求引领的建设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布局结构优化；深化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衔接；健全评价与保障机制，为学科专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充分发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组的平台作用，突出省级统筹，压实高校主体责任，引导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不断提升人才供需适配度。

上海市教委、浙江省教育厅、清华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作交流发言。

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组办公室成员单位、教育部相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有关高校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教育部官网，2026.1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决策部署，积极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以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契机，以适应技术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方向，积极增强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赋能传统岗位、提升就业质量、激发创业活力的正面效应，有效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努力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促进、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

二、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

（一）拓展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鼓励东部地区布局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引导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承接数据标注、智能终端制造等上下游产业，加快形成人工智能领域就业新增长点。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金融助企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支持范围，创造更多就业新岗位新机会。

（二）培育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新动能。实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以开源生态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加强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供给，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保障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平等使用数据、算法等智能生产要素，支持中小微企业探索低成本、轻量化智能升级路径，进一步降低人工智能应用门槛，提升吸纳就业能力。

（三）创造人工智能领域就业创业新模式。发挥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按照市场化方式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创新发展。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部署实施一批优质开源项目，形成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推行“科技成果＋创业”、“产业发展＋创业”、“职业技能＋创业”、“民生需求＋创业”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落实创业支持政策，提供创业孵化服务。

（四）加快开发人工智能领域新职业。围绕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和大规模应用，加快开发新职业、发布新职业标准，扩大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新工种需求。鼓励地方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增设相关职称评审专业，及时开展人工智能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三、构建就业友好型人工智能升级路径

（五）挖掘传统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潜能。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引导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中更好推行人机协作模式，挖掘传统领域数智化就业机会。加快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拓展体验消费、个性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

（六）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发挥人工智能在改善就业环境、提升职业安全水平、提高工作质效等方面的作用，优先在劳动力紧缺、环境高危等岗位推广应用。稳慎把握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应用的范围、力度、节奏，尽可能减少对从业人员的冲击。鼓励企业探索建立失业缓冲期制度，在大规模推广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提前告知受影响劳动者、提供转型转岗就业支持。

（七）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评估机制。综合评估人工智能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

方面倾斜。对市场准入领域可能造成较大就业冲击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项目，在评审时同步开展就业风险评估，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转型转岗就业支持工作。对其他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项目，结合实际开展就业风险评估。

四、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就业能力

（八）协同培养人工智能创新型人才。鼓励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加快动态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超常规布局人工智能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加强相关交叉学科专业建设，增加人工智能“微专业”布点，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培养更多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强化校企联合培养，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参与课程开发、师资培养、教学设施升级等。扎实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推动学生入企实践、企业工程师入校授课，培养学生探索性、创造性思维能力。

（九）实施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计划。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地方在开展项目制、订单式数字化技术技能培训时，要紧贴人工智能领域市场需求，鼓励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农民工、失业人员等参加人工智能领域就业创业培训项目。鼓励地方依托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技能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网上学习平台、继续教育网络平台等，推出更多公益课程。鼓励在现有职业技能大赛中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技能竞赛活动。

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品质就业政策服务

（十）运用人工智能助力就业政策落实。探索构建政策落实智能识别机制，分析服务对象特征，智能推送就业政策，提升“政策找人”质效。加强人工智能在就业政策评估、资金管理、宣传解读和咨询等方面的应用。

（十一）提高就业服务智能化水平。升级完善全国就业信息资源库、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中国就业”公共服务

平台，强化数据归集、智能分析、精准服务。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统筹现有资源探索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网络智能升级，深化人工智能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等领域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服务，鼓励经营主体创新优化求职招聘大模型、智能面试、虚拟现实培训等新产品新模式。

（十二）加大转型转岗就业支持力度。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受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劳动者做好就业帮扶，提供针对性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创业支持等服务。按规定对有关参保失业人员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待遇。

六、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十三）优化适应人机协同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针对人机协同等社会分工新特点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研究，健全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督促企业依法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等合法权益。规范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应用，依法治理因滥用算法等造成的就业歧视、虚假招聘、侵犯隐私权休息权等违法违规行为。

（十四）完善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灵活性、包容性，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十五）健全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收入分配机制。引导企业建立健全符合人工智能领域从业人员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机制，落实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指引。培育发展智能代理等创新型工作形态，鼓励企业加大对公益性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和开源社区的投入力度，帮助劳动者拓展能力边界、提升劳动价值，推动更多劳动者积极参与技术进步并从中获益。

七、完善人工智能应用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体系

（十六）强化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监测预警。加强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就业等数据跨部门共享，共建区域性、行业性就业数据智能监测分析模型。强化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预研预判，提升就业风险监测预警灵敏度。

（十七）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就业影响研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就业影响专项调查，持续跟踪人工智能应用渗透、岗位创造替代、技能需求变化等情况。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现有资源，布局一批人工智能就业研究中心。实施好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前瞻性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就业、收入分配的影响。

（十八）健全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应对机制。将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纳入规模性失业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应对范围，统筹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强化人工智能相关劳动关系风险联合应对，做好风险会商研判和处置。

八、加强组织实施

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统筹考虑人工智能应用就业影响，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中国政府网，2026.10）

【政策解读】

◆国务院学位办负责人解读《关于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工作的意见》

近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意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持续扩大，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分类发展进入关键期。以往“唯学位论文”的学位评价方式相对单一，难以充分反映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践创新方面的能力和贡献。2024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颁布，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研究生可以“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申请学位”,对改革学位授予机制和评价标准提出新要求。2024 年 9 月，《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率先发布，取得良好成效，140 余名工程硕博士专项试点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积累了一批鲜活的实践案例，沉淀出可复制的改革经验。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制定了《关于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是深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旨在主动回应战线现实需求与改革关切，将法律规定细化为可落地操作的工作要求，为各地各校科学、规范开展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工作提供政策遵循，切实把好学位授予质量。

因此，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评价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要坚持质量为先，切实保障实践成果的水平和质量，完善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标准、机制和流程。深刻把握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客观差异，分类、分步做好试行探索和推广迭代。

《意见》的核心思想和主要目标。

《意见》立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实际，紧紧围绕深化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强化专业学位实践育人导向，着力推动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见效。

一是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契合学位授予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是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要推动各方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改革定位，充分理解这项制度创新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是稳妥有序推进改革实施。这项改革仍处在试行探索阶段，不宜“一刀切”地全面铺开，要分批次推进各专业学位类别试行。各地各学位授予单位要立足自身基础条件，遵循“试点—评估—推广”工作节奏，分类、分步推进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落地实施。

三是严格全流程质量把关。坚持质量为先，把质量导向贯穿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一方面，推动将实践成果培育深度嵌入课程教学、专业实践、学位申请等培养全链条；另一方面严格落实选题论证、成果鉴定、专家评阅、答辩考核等各环节评价要求，层层压实质量责任，从严把好各道质量关口。

四是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各专业学位教指委指导作用，强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属地统筹管理职能，压紧压实学位授予单位主体责任，推动有关单位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保障改革规范有序落地。

如何充分发挥教指委指导作用？

充分发挥教指委指导作用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布本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以下简称《基本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立足本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规律，研制相应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基本要求》，明确不同类型（形态）实践成果的来源与形式、内容结构、写作规范及评价

参考要素等。《基本要求》是学位授予单位制定实施细则的重要参考依据，各教指委要切实做好发布和迭代更新工作。

二是指导学位授予单位完善相关制度。各教指委要指导学位授予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实施细则，健全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制度安排与流程规范，形成课程学习、专业实践与成果产出贯通衔接的培养链条，加强规范化、体系化、制度化建设。

三是有组织开展政策解读与导师培训。各教指委要持续开展专家解读、交流研讨、成果展示等常态化、系统性政策宣讲，引导各方深化对突出实践导向、契合专业学位培养规律、重视学位授予质量等理念的共识。聚焦理念宣传、方法指导、经验交流等主题，组织专题性、体系化导师培训，将经过培训并获得相应资质的校内外导师纳入实践成果评阅专家库。

如何压实学位授予单位主体责任？

一是细化各项制度流程。结合本单位实际，分类完善各专业学位类别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实施细则，细化制定全流程工作指南，严格贡献认定与过程管理，并将实施细则及时向教指委备案、向师生公开。同步完善学位管理有关制度及配套文件，构建全方位、全过程质量保障制度体系。

二是强化行业产业深度参与。在选题、指导、评价等环节提高行业产业参与度，提升人才培养适配度。在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教学、实践训练、学位授予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与行业产业的资源共享、标准共研和机制共建，促进人才培养、成果产出与产业需求紧密衔接。

三是统筹推进政策宣讲、资源保障。引导专业学位研究生正确认识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实施条件与规范要求，综合评估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实践基础和能力。将实践成果培育融入招生选拔、课程教学、专业实践、学位申请全流程，强化实践资源保障，优化专业实践模式，增强课程设计与以实践成果

申请学位要求的匹配度，全面提升研究生创新实践的视野和能力。

如何推动《意见》落地见效？

答：推动《意见》落地见效，关键在落实。我们将坚持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分批次发布《基本要求》。指导各专业学位教指委研制本类别硕士、博士《基本要求》，明确不同专业学位类别实践成果的具体要求，并视文件研制成熟度、产教协同基础等条件分批次发布，首批拟在翻译、农业、临床医学、会计、艺术5个专业学位类别先行先试。

二是有序试行推广。指导各地各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出台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实施细则，更新培养方案，修订学位授予办法，支持在有意愿、有条件、有实践基础的师生中试点实施，有序试行推广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机制，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指导解决。

三是加强制度保障。会同有关单位完善实践成果抽检与结果使用机制，建立容错机制以保护改革积极性。压实省级部门管理职责，加强关键环节监测与督办促改。加强部门协同，建好专家库与案例库，探索实践成果转化应用机制，激发改革内生动力。

四是强化政策宣讲与培训。持续开展专家解读、交流研讨、成果展示等常态化、系统性政策宣讲，组织专题性、体系化的导师培训，引导各方深化实践导向的专业学位培养共识，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教育部官网，2026.10）

【新闻短讯】

◆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采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的学科口径，2026排名榜单包括100个一级学

科和 5 个专业学位类别，其中中共党史党建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是今年新增的 2 个排名学科。各个学科排名的对象是在该学科设有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校，发布的是学科排名前50%的高校，共有 531 所高校的 5343 个学科点上榜。

根据统计，共有 118 所大学的 336 个学科点入选中国顶尖学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以 25 个和 21 个中国顶尖学科位列全国前二，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各有 15 个顶尖学科、并列第三，浙江大学以 13 个顶尖学科占据第五名，中国人民大学以 12 个顶尖学科紧随其后。

一批非“双一流”高校凭借其在特色领域的突出表现，也有学科进入中国顶尖行列。上海戏剧学院有 2 个顶尖学科，北京舞蹈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这 20 所高校各有 1 个顶尖学科。

按照上榜学科数量统计，中山大学有 64 个学科上榜，名列前茅，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紧随其后，分别有 61 个和 60 个学科上榜，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以 56 个上榜学科数并列第四名，吉林大学有 55 个学科上榜，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各有 54 个学科上榜，山东大学则有 52 个学科上榜。非“双一流”高校中，深圳大学上榜学科数最多，共上榜 36 个学科，广州大学、扬州大学各有 28 个上榜学科，在非“双一流”高校中并列第二。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江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上榜学科数也都达到 20 个或以上。

从各省级行政区的上榜学科数量分布看，北京占据绝对优势，各层次的上榜学科数量都高居全国第一。上海前 3%的顶尖

学科数和前 7%、前 12%的一流学科数均位列全国第二，高峰高原学科建设成效显著。江苏的前 50%学科数紧随北京，上榜数位列全国第二，学科整体实力难以撼动。此外，湖北、浙江、陕西等省的中国顶尖学科数量处于国内前列，广东、山东、湖北、浙江、陕西等省的上榜学科总数较多。

我校 24 个学科上榜，其中一级学科 21 个，专业学位类别 3 个。上榜学科数量位居全国第 70 位。

上榜的学科中，前 7%学科 2 个，分别为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前 8-12%学科 3 个，一级学科有艺术学、心理学，专业学位有美术与书法；前 13-20%学科 5 个，一级学科有数学、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理学，专业学位有戏剧与影视、音乐；前 21%-50%学科 14 个，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学、体育学、应用经济学、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护理学、生态学、中国史、生物学、基础医学、物理学、药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软科，2026.10）

【高教动态】

◆以创新创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系，也是其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作出系统部署。提质与扩容相互支撑，培养规模扩大对课程、师资、科研平台和实践场景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质量提升也需要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资源配置方式。创新创业教育以真实问题为牵引，把教学、科研和社会需求贯通起来，能够使知识生产转化为育人资源，使校内外资源转化为协同培养条件。由此形成的资源链接和育人转化机制，为扩大优质教育供给奠定质量基础，也为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注入持续动力。

1.以功能贯通提升高等教育战略支撑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汇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重要结合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高等教育既要持续拓展知识边界，也要推动知识创造更有效地进入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创新创业教育为这种功能贯通提供了具体载体。它将科研探索中的新知识转化为课程内容和训练项目，又把产业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带回教学科研过程，促使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实践应用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循环运行越顺畅，高等教育越能把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转化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能力。

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形成知识创造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的运行机制。大学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具有内在联系。科研活动持续更新教学内容，人才培养又为科学研究提供富有创造力的主体。创新创业教育把应用场景和实践反馈引入这一过程，使受教育者能够参与问题发现、方案设计和成果验证的过程，也使科研人员能够更加敏锐地把握知识应用的条件与边界。知识创造由此获得更广阔的育人空间，人才培养也获得持续更新的内容来源。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便有了内生动力，教育链、创新链和人才链之间也能形成更加稳定的联动关系。

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其形成和发展最终依靠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人才。面对技术快速迭代和产业深度转型，人才需要在复杂场景中识别关键问题，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持续修正解决方案。创新创业教育把专业学习嵌入创造性实践，使知识在运用中得到理解和检验，使受教育者逐步形成面向未来的行动能力。

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拓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空间。高等教育扩容首先表现为更多人获得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其质量基础在于课程、导师和实践资源同步增长。传统育人资源主要集中于课堂和校内机构，承载范围容易受到组织边界限制。创新创业教育通过开放科研平台、建设跨校项目和引入社会场景，把实验室成果、行业实践与公共服务需求转化为可共享的学习资源。不同类型高校可以依托自身学科特色和区域条件参与协同育人，使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组合。这样的扩容能够保持人才培养质量，也能增强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能力。

2.以实践牵引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式

创新创业教育促进高等教育提质的深层作用，体现在人才培养过程的塑造。它把相对分离的课堂学习、科研训练和社会实践连接起来，使知识学习从接受既定结论转向理解问题、生成与参与知识创造。受教育者在真实情境中调动专业知识，并在实践反馈中修正认识，专业能力、创新能力由此获得共同发展的空间。

以真实问题深化知识理解。高水平学习需要理解问题从何而来，掌握方法如何形成，明确知识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创新创业教育将受教育者带入开放而具体的实践情境，让专业知识具有清晰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边界。当受教育者面对来自企业、社区和公共部门的真实需求时，需要综合运用课程知识、实验方法和调查研究，在反复论证中形成方案，在反馈修正中深化理解。知识由此从书本结论转化为分析现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过程也从单向接受转化为主动建构。真实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还能帮助受教育者认识专业知识的限度，形成尊重事实、重视证据的思维习惯。

以跨界协作促进知识重组。许多重要创新发生在学科交叉处，现实问题本身也很少按照既有学科边界展开。创新创业项目围绕具体任务组织知识与人员，能够促使不同学科从并列参

与走向实质对话。参与者需要说明各自方法的适用条件，理解其他学科的观察角度，并围绕共同目标调整原有方案。这个过程推动知识在问题解决中重新组合，也使学科建设及时感知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跨学科培养因而具有明确的育人落点，即帮助学生形成整合知识、协同研究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以价值创造深化立德树人。创新创业实践让受教育者直接接触人民生活、产业运行和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境。一个方案能否产生积极效果，既取决于技术和管理能力，也受到公共利益、伦理规范与现实条件的约束。受教育者在倾听需求、承担分工和接受结果检验的过程中，能够更具体地理解个人创造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责任意识、诚信观念和合作精神由此落实到真实行动之中。创新创业教育的育人价值，也就体现为引导青年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需要和人民需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增长才干、涵养品格。

3.以协同生态扩大优质育人资源供给

创新创业教育的育人成效取决于稳定而开放的办学生态。高等学校需要把相关理念落实到培养方案、实践平台和评价制度之中，推动校内教学科研资源与社会创新资源有序衔接。通过课程贯通、平台开放和制度保障，更多受教育者才能持续获得高质量的创新实践机会，优质育人资源也才能在扩大供给的过程中保持应有水准。

完善融入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创业教育应当进入不同学科专业的培养过程，并依据学生成长规律形成递进安排。基础课程着重培养问题意识和科学思维，专业课程引导学生理解学科前沿及其现实应用，实践课程支持学生开展方案设计和反复验证。研究型大学可以加强科研训练与创新实践的衔接，应用型高校可以突出产业问题和技术应用，其他培养单位也应结合自身定位形成适宜路径。创新创业教育由此成为深化

专业学习的重要方式，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形成发现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建设开放协同的创新实践平台。平台建设的关键在于把分散的师资、项目和场景组织为连续的育人过程。高校可以依托重点实验室、大学科技园和创新创业学院等现有载体，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发展问题设置长期项目，推动科研人员、专业教师和实践导师共同参与指导。项目设计应覆盖需求发现、方案形成、验证改进和成果表达等环节，使受教育者能够经历较为完整的创造过程。条件成熟的高校还可以推动课程、项目和实验条件跨院系、跨学校共享，扩大优质实践资源的覆盖范围。

深化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高水平科研能够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前沿知识，产业和社会实践能够为其提供真实问题。高校与科研院所可以推动科研平台向教学适度开放，把有条件的科研任务转化为训练项目。政府、企业和地方园区可以通过提供实践场景、参与项目指导等方式进入人才培养过程。科教融汇帮助受教育者理解知识创新的逻辑，产教融合帮助其把握知识应用的条件。二者在育人目标下有效衔接，能够增加优质项目、导师和场景的供给，使扩大培养规模拥有更加充足的资源支撑。

健全体现育人成效的评价保障机制。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评价制度需要尊重人才成长与知识创新的规律。对学生的评价应更加关注知识运用、问题解决和学习增量，合理看待项目结果。对教师的评价应体现在课程建设、实践指导和科研成果转化为育人资源的实际贡献。学校还应完善创新实践学分认定、弹性学习安排、项目资助和导师支持，为师生开展持续探索提供稳定条件。评价导向更加清晰，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创新创业教育才能从阶段性活动转化为长期育人安排。

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的落脚点，在于让更多受教育者获得更高质量的成长机会，并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国家发展优势。创新

创业教育通过贯通高等教育的多重功能、重塑人才培养过程、扩大优质育人资源供给，使提质获得实践载体，使扩容具备质量支撑。面向未来，应持续推动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办学全过程，引导高校在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实践中更新教育内容、改进培养方式、完善资源配置，培养更多能够发现真问题、创造新知识、担当时代责任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光明日报，2026.10）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省域实践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强调“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这一战略背景下，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逻辑正由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由单一产业演进转向教育、科技、人才全要素的深度交互与动态升级。这要求高等教育突破传统的人才培养职能，向学科布局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等全链条延伸，成为产业创新的策源地与新动能的孵化器。省域高等教育承担着把中央战略部署转化为地方产业动能的重要职能，如何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找准定位，在产业变革中体现价值，是当前亟待回答的课题。

充分认识高等教育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强国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高等教育在其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功能。正确理解这一命题，需要秉持“跳出教育办教育”理念，重新审视高校在产业发展中的定位，引导高校加快从自我发展“小逻辑”向服务发展“大逻辑”转变。

从国家战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高等教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靠教育。在学科端预判技术方向，在人才端储备复合能力，在科技端供给原创成果，在转化端打通工程化通道，哪一个环节掉链子，教育对生产力的支撑都会大打折扣。

从区域发展看，高等教育强省不只看排名与规模，更看实际贡献。在传统模式下，校地合作多为点状、零散的，缺乏以产业链为单位的系统性安排。高校有学科、有人才、有成果，企业有设备、有场景、有需求，但两者之间缺少制度化接口。全链条服务的要义，是把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科研组织、平台共享、成果转化置于产业场景。前端以产业需求牵引学科专业，中端以校企地联合培养与联合攻关嵌入生产过程，后端以概念验证、中试熟化、赋权转化推动成果落地，再以产业反馈优化专业与评价。这种“链对链”模式能够把有限的高教资源组织成体系，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碎片化。

从教育自身看，适配产业形态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制造等新技术重塑岗位结构，知识更新周期大幅缩短，传统的“知识传授型”培养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产业一线需要。高校培养的人才，既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要有跨界整合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科专业作为供给的“桥头堡”，也不能再固守学科逻辑，而要更多转向产业逻辑，建立随产业升级动态调整的机制。

从转化链条看，高校不缺科研成果，缺的是让科研成果走出校门的“最后一公里”。从实验室样品到生产线产品，中间隔着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工程化开发等多个环节。哪个环节薄弱，成果都可能“死在路上”。全链条服务把转化工作置于科研选题之前，让企业出题、市场评价，再用平台汇聚要素资源、用赋权激发内生动力，才有希望把更多抽屉里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高等教育服务产业面临的卡点堵点

近年来，高校服务产业取得长足进展，但对照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仍存在一些共性堵点。

人才供给适配性不足，学科专业存在“时间差”。传统学科占比偏高，新兴交叉学科布局不足，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领域人才缺口较大。专业设置习惯于从学科目录和学校既有条件出发，产业需求信号在传递中层层衰减。培养方案更新偏慢，工程实践、跨学科训练、创新转化能力培养不够，毕业生“会考试不会解题、有知识不会创造”。深层原因是缺少供需对接的刚性机制，招生、培养、就业没有真正联动起来。

产教主体融合度不深，创新要素存在“玻璃门”。在传统的产教融合中，企业首要考虑的是即时解决方案，高校首要考虑的是学术成果，院所首要考虑的是平台和项目，地方首要考虑的是招商和税收，结果常是“校热、企冷”“上端热、终端冷”“项目热、机制冷”。人才编制固化在高校，教师进企业缺少考核和激励保障，企业专家进校园、进课堂缺少常态化机制通道。校企合作多为零星委托，校院之间的仪器设备、科研数据、研究生培养过程难以互通。中小微企业因单个项目体量小、需求散而难以获得高校稳定支持。没有以产业链为单元的结对共享制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就容易停留在表面。

成果转化链条不畅，存在“不能转、不会转、不敢转”。源头上，不少科研选题从文献中来、从课题指南中来，不是从企业生产一线中来，成果从起点就偏离了需求，造成“不能转”。中端环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不足，教师不熟悉“从1到100”的工程化开发，高校技术经纪人队伍薄弱，造成“不会转”。激励方面，职务科技成果按国有资产管理，定价、作价入股、尽职免责等规则不清，科研人员担心“转了被追责、不转最安全”，造成“不敢转”。

破解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卡点堵点的浙江实践

浙江省的产业特点是以民营经济为主，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明显、县域经济发达，但由于历史等原因，高水平大学和高端科教资源相对不足。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把“高校办在产业链上”，以“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对合作为总抓手，出台《高等教育服务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行动方案（2026—2028 年）》，聚焦高等教育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共性堵点，对全省高校逐一明确重点合作平台、重点服务企业和重点产业集群和重点攻关任务，推动学科专业与区域发展适配度全面增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全面深化，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全面提升。

直面“适配性”不足，以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夯实产业人才基座。当前，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往往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人才培养目标与岗位实际要求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供需错位问题在部分领域仍然突出。浙江省将提升适配性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从高水平大学建设、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三个环节同步发力，以更好地适应产业需求侧。一是增强高水平大学牵引力。深入实施“双一流 196 工程”，省委常委会 5 次专题研究、“一校一策”支持 12 所高水平大学建设，以新机制建设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此基础上，构建“登峰、优势特色、一流 A、一流 B”四个梯次的一流学科建设体系，引导全省高校分类特色发展，“一城一名校”支持每个设区市重点建设好 1—2 所高校，加快打造一批高水平应用型高校。二是增强学科专业支撑度。以服务重点产业为导向，编制“急需、保护、优化”学科专业三张引导清单，建立差异化生均拨款机制，对 17 个急需专业大类按照 1.2 系数提高生均经费。聚焦“极前沿、极交叉”方向，以“重点任务导向+人工智能驱动+国际资源整合”模式，支持高校创设交叉学科中心。三是增强人才培养创造力。出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高教十条”，明确发展规划优先谋划教育教学、经费安排优先满足教育教学、教师配置优先保障教育教

学、领导精力优先投入教育教学的“四个教学优先”。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绘制专业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素养图谱，倒逼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推广浙江大学创新引领的创业教育模式，构建“理论课程+竞赛实践+项目孵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实现全省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推动培养更多“会创造的人”。强化招生培养就业一体联动，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评价高校办学绩效的重要内容。深化专业学位评价改革，2026 年 23 所高校 40 名专业学位硕博士跑通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案例，超八成实践成果已实现转化落地。

直击“融合度”不深，以教育科技人才贯通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浙江省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 5 万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100 多家，但“校企”“校院”“校地”不同主体之间的创新要素流动仍存在障碍，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不健全，平台资源开放共享不充分，产业、科技与教育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定高效的贯通机制。破解这一问题，关键是打通主体之间的边界，让人员、平台、项目和成果按需求自由流动。浙江省以“校企共赢、校院共融、校地共生”为总体框架，推动创新要素在产业端、平台端和县域端高效配置。一是深化“校企”共赢。以校、院、企人才“互聘共享”为突破口，全面推广“科技副总”“产业教授”制度，带动市县万名副高职称以上人才参与流动共享。完善“编制在高校、工作在平台、服务在企业”的共享模式，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态初步形成。二是深化“校院”共融。推进高水平大学与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融合发展，以科教融合学院为主要载体，推动省属高校与高能级平台深度合作，重点解决科研与教学“两张皮”、平台与学科“不搭界”的问题。按照“高校+平台”模式建设科教融合学院，实行人才双聘双跨、任务共担、成果共享，建立大型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高校开放共享清单，推动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向高校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开放课题、开放数据、开放场景。把研究生招生计划向平台联合培养倾斜，由高校导师

和平台导师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学位论文，使学生在承担真实科研任务过程中完成学业。从根本上改变校院之间松散合作的局面，实现“1+1>2”的聚合效应。三是深化“校地”共生。高校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而产业布局分布于县域单元，这一错位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浙江省启动“百校对百县”供需合作行动，建立1所高校重点服务1个县（市、区）合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高校—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学研供需对接，探索建设技术成果与人才供需集市，在举办毕业生招聘会同时，一并组织“小而精”技术成果展示交易活动。

直奔“转化链”不畅，以产学研协同助推产业焕新迭代。高校是科技成果的“富矿”，但“富矿”不等于“现实生产力”。从实验室的基础研究突破，到中试熟化的技术验证，再到规模化生产的市场应用，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浙江省以产学研协同为主线，从科研选题、转化平台、制度激励三个环节同时发力，推动科技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是以“四题一评”破“不能转”问题。推动高水平大学探索设立以企业共性技术和工程问题为导向的科研征集、筛选、凝练、攻关机制。高校单个到账经费300万元以上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可上升为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让真正来自产业一线的攻关课题能够获得省级科技计划资源支持。将市场评价和实际成效作为教师岗位聘任、职称评聘、团队考核、科研经费配置等的重要依据，单设社会服务型教授聘任通道。二是以“产教融合”破“不会转”问题。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纺织新材料等5个重点产业领域，探索建设“源头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创业就业、国际合作”等功能为一体的产教融合创新中心，打造“校园+科技园+产业园”未来大学新形态。大力推动公共服务转化平台建设，建立高校技术转移机构300多家、专兼职技术经纪人队伍2000多人，推动15所高校牵头或参与建设概念验证中心64个、累计完成验证项

目 1478 个，参与建设中试平台 36 个，累计完成中试项目 388 个。三是以“赋权改革”破“不敢转”问题。推进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单列管理、“先用后转”“先转后补”、尽职免责容错等集成改革。扩大高校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在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推行经费包干制。允许高校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成果完成人，权属比例最高可达 90%。高校科技成果经“安心屋”转化的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对企业排名第一、高校排名第二的项目和成果，在高校年度综合考核、学科绩效评价时视同高校为第一单位，有效调动校企协同攻关积极性。

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未来展望

面向未来，高等教育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还需要在认识、制度和开放维度上继续深化，更加突出以产业为导向的全景式服务、突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突出以绩效为导向的闭环化机制。

增强高等教育对产业变革的引领作用。长期以来，高校主要在产业结构基本成型后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具有较明显的适应型特征。未来产业技术路线不确定，许多方向要靠原始创新去开辟。高校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建立长周期、稳定支持的评价机制，鼓励教师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产业未来方向开展自由探索。学科专业设置不仅要满足当前产业需求，还要以前瞻布局塑造未来产业方向，培养能够创造新岗位、开拓新赛道的人才。这样，高校才能真正成为产业变革的策源地，而不是单纯的技能供给方。

推动产教融合从项目合作走向机制建设。当前，产教融合更多依赖领导重视和专项政策，持续性有待增强。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明确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在协同育人、联合攻关、成果转化中的权责。建立区域教育科技人才数据平台，推动人才需求、学科设置、科研选题、转化应用等信息共享。完善高校分类评价，对不同类型高校实行差异化考核，

使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和高职院校都能找到服务产业的合适路径。把行之有效的改革上升为制度安排，产教融合才能从示范项目走向常态运行。

构建更加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可能包揽创新全链条，需要与企业、科研院所、资本和中介组织共同构成创新网络。要支持高水平大学与新型研发机构、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平台，推动学科交叉从零散拼盘走向实质融合。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改变科研方式和学习方式，高校既要善于运用智能工具提升效率，也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和数字素养培养。通过组织形态创新，使知识生产、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在同一生态中相互赋能。

在开放合作中统筹安全与发展。未来产业竞争本质上是人才和制度竞争。高校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与海外高水平大学和跨国公司共建实验室、学位项目和联合研究中心，在开放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同时要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攻关，对涉及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合作项目建立评估机制。把开放创新与自主安全统一起来，高等教育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更加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韧性。产业转型升级不是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增强经济体系抵御冲击、快速恢复和转型适应的能力。高等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既是人力资本的蓄水池，也是社会运行的稳定器。高校要把服务视野从短期的产业对接拓展到长期的社会发展。要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终身学习体系，扩大在职培训、继续教育和技能重塑供给，帮助劳动者在产业波动中顺利转型。要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资源向中西部和基层延伸，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为经济发展筑牢社会基础。要加强绿色低碳、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学科建设和高端智库建设，为应对气候变化、重大疫情等系统性风险提供知识和人才储备。

面向未来，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完善，也不仅仅是服务产业的工具性变革，而是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在制度层面的整合重塑。这既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深层期待。高等教育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从政策推动转向生态建设，从局部合作转向全面融合，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上同步发力。只有这样，才能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求落到产业实践之中，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高等教育，2026.10）

【学科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成立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启动

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大国之学”，答“时代之题”。

10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正式成立，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同步启动。来自六大洲57个国家的70余位政要学者致贺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20余所高校共同参与联盟建设，推动人才培养、战略研究、国际交流与知识创新紧密结合，将研究优势转化为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的实际能力，在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中展现责任担当。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中联部原副部长艾平，中国前驻韩国大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邱国洪，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贾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程，西北大学副校长韩志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刘卿，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郑东超出席活动。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相关部处和学院的负责同志、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参加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新业主持致辞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成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沃尔图、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秘鲁前总理爱德华多·阿拉纳·伊萨、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巴耶夫、波黑前部长会议主席兹拉特科·拉古姆季亚、坦桑尼亚革命党前副总书记约翰·维安尼·基塔扬巴·蒙盖拉等来自 57 个国家的 70 余位政要学者致贺电。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将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贯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全过程。区域国别学院与全球领导力学院实行“两块牌子、一体运行”，联合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共同建设，培养扎根中国、通晓世界，兼具深厚学养、战略思维和实践本领的高层次人才。区域国别学院将进一步推动教学科研与智库建设贯通，深化国别调查、区域比较与全球性问题研究，增强对国际形势和各国政情民意的战略研判能力，推动原创性研究成果向政策咨询、国际交流和国际传播转化。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全国 20 余所高校共同参与。联盟将面向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汇聚跨高校、跨学科研究力量，围绕世界格局演变、区域国别重大问题及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开展协同研究，促进信息共享、资源互补、优势集成。通过深化研究协作和成果交流，推动形成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理论、中国方法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国家战略研究与对外交流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知识基础。

张东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大国之大，既在体量之大，更在格局之大、视野之大、学问之大、贡献之大。区域国别学是“大学之学”，更是“大国之学”。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可追溯至陕北公学时期，经过几代学者接续耕耘，已布局整体性、全局性、战略性平台，基本实现对全球主要国家和重点地区的覆盖。此次升级成立区域国别学院、启动联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一流学科的应有之义，更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动担当。他强调，面向未来，要胸怀“两个大局”，打造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先锋阵地；坚持学用贯通，探索“区域国别学+全球领导力”复合型培养模式，培育先锋力量；深化交叉融合，打造建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先锋高地；做强以研传声，打造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先锋窗口。中国人民大学将秉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担当，汇聚各方智慧、深化协同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更加坚实的战略支撑。

艾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切需要深化对各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情民意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势，成立区域国别学院，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的重要举措。希望学院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原创性研究提升学术水平，以开放协同汇聚研究合力，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准确把握不同国家的发展实际和现实关切，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认同。同时，立足自身特色，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深化资料共享、联合调研和重大课题协同攻关，不断提升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能力和水平。

贾鹏表示，衷心希望学院充分发挥人大多学科优势和国际合作网络，鼓励学生开展跨学科学习探究，支持学生到对象国开展田野调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坚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形成更多回应现实关切、服务科学决策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为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高程表示，区域国别学不仅是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性新兴交叉学科，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的“大国之学”。中国人民大学长期深耕国际问题与区域国别研究，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学术研究与智库资政相互促进的鲜明优势。区域国别学院的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学校深厚的学术积淀、优势学科资源和智库资政经验，提升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服务国家决策的整体效能。期待以此次学院成立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校际合作，围绕重大现实问题联合攻关、协同资政，探索交叉学科育人路径，共同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培养复合型涉外人才、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取得更多成果。

张东刚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杰，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刘青，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经济学院教授宋扬，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颁发双聘教师证书。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发布《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新型全球领导力体系共建：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探索》研究报告。

报告立足国际力量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系统阐释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与新型全球领导力体系共建的内在联系和实践方向。报告指出，新型全球领导力体系应以主权平等、文明多样性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基础，通过

平等协商、责任共担、成果共享，推动合作共识转化为持续有效的集体行动。区域国别研究既是深入理解不同国家历史文化、制度环境和发展道路的重要知识基础，也是增进相互理解、促进规则协商、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支撑。

围绕知识共同生成、制度参与能力提升和跨文明集体行动三个关键环节，报告提出构建平等互嵌的跨文明知识共同体、完善知识转化与制度协商机制、建设梯度适配的跨文化合作网络、打造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协同研究体系等实践举措，强调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国际伙伴的知识交流和联合研究，推动不同国家和社会主体平等参与国际议题设置、规则协商与合作实践，促进国际合作从知识共享走向共同行动。

报告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深化国际社会相互理解、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有益参考，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更好转化为服务国家对外工作、促进国际合作的现实力量。

如何以中国立场、中国视角研究世界？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创新研究范式？如何贯通理论与实践，培养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层次人才？

在专家研讨环节，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组织的专家学者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新方向、新任务。

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新机遇、新挑战与新方向”专题讨论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中国前驻韩国大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邱国洪，西北大学副校长韩志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刘卿，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郑东超围绕世界格局演变、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副院长江晓丽主持。

在“如何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专题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大学边疆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苗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党委书记王珩，《现代国际关系》期刊副主编吴兴佐围绕区域国别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方法拓展、学科交叉融合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巍主持。

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新选题与人才培养新方向”专题讨论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西北大学期刊管理中心主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卫玲，《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主任赵青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副编审董宇宇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前沿议题、学科发展方向、学术成果传播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展开研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主持。

从陕北公学时期的国别研究探索，到今天实体学院与全国性联盟协同启航，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把研究世界同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面向未来，学校将把学术研究的深度转化为战略研判的精度，把人才培养的成效转化为涉外工作的支撑，把文明交流的广度转化为国际合作的实效，在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中展现新时代人大人的担当。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2026.10）

【常春藤高校】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培养模式的转型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建立及发展过程，是美国教师教育机构转型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代表。作为美国综合性大学师范学院的“开篇之作”，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历史可视为“美国师范教育的历史缩影”。

目前，我国学者已从多个角度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展开了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角度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师培养模式进行探究，以期为我们科学地把握和推进教师教育提供启示。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培养模式的转型，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师培养模式经历了从“技能训练型”到“综合素养型”，再到“反思实践型”的发展过程。这一转型以社会需求和教育改革需求为导向，主要通过调整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和转变教育实习方式等手段实现。总体而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培养模式的转型，既是师范院校对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需求的积极回应，也彰显了其在教师教育领域所发挥的创新和引领作用。

（一）教师培养模式转型以顺应时代需求为导向

由于不同时代对教师的需求各异，教师的培养模式也需要随之做出调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要通过以下方式使教师培养模式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一是根据时代需求的变化调整教师培养目标。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要进行“技能训练型”教师的培养；20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及中等教育改革的影响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师培养目标转向“综合素养型”教师，强调教师社会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随着“反思实践型”教师成为教师培养的主要目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又开始注重教师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与专业人格的全方位发展，培养具备批判性和反思能力的教师。从上述培养目标的调整可以看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不断适应时代需求和教育变革。

二是根据社会需求更新教师培养理念。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创立初期，为满足工业教育的培训需求，教师培养主要为手工业和工业教育服务，强调成功的教学依赖于教师对教学方法的熟练掌握；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引发了失业人数增多、生活水平下降、家庭关系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还有各种形式的农民、工人反抗运动，在此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秉持“民主与社会关怀”的教育理念，推出了社会取向的教师培养项目；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培养“反思实践型”教师成为世界各国教师教育努力的方向，教师不仅仅是课程的实施者，还应是教育问题的探究者、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者、终身学习者、社区实践的合作者及社会正义的探索者。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通过调整教师培养层次、课程设置和教育实习等，实现了教师培养模式的转型。

（二）教师培养模式转型以课程设置和教育实习为抓手

课程设置与教育实习是教师培养模式的核心。在教师培养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要以课程设置和教育实习的调整为实践路径。其一，通过拓展课程内容和调整课程结构，顺应时代发展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在课程内容上，实现了从单一技能训练到多元化课程内容的转变；在课程结构上，更加强调综合性，注重整合学科知识、社会生活与学生经验。其二，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实习方式也在不断优化。最初，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实习侧重培养师范生的教学技能；随后，教育实习强调对教育学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以及研究能力的提升；再后来，“驻校实习”的教育实习方式更加注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融通。总之，教育实习的不断优化，体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使其教师培养模式更加适应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求。

（三）教师培养模式转型得益于关键人物的推动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培养模式的转型，得益于关键人物的积极推动。总体而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培养模式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一是大学应当依据社会和教育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教师教育的目标。大学培养的教师既要回应教育发展对教师学历层次、素养构成、学科结构等多方面的要求，同时作为社会机构，大学培养的教师也应秉持“民主与社会关怀”理念，体现社会价值取向。二是教师培养模式应以课程设置为抓手，优化教师培养方式。当前我国师范生的课程设置仍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学科知识导向的教育观念过重、实践操作内容相对匮乏、课程结构不够优化、教师的自主探索意识薄弱以及面对多样挑战与快速变化的适应能力有待提升等。为此，我们可以参考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促进教师培养模式转型的思路，通过强化教师教育课程的素养导向、开展多元化的课程设计、采用多样化与情境化的课程实施方式等，优化调整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三是教师培养应明确并充分发挥教育实习的价值。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立之初，教育实习就是其教师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与中小学校建立教育实习合作，到创建新学院作为实习场所，再到由中小学与大学共同设计和实施教育实习项目，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师培养模式不断更新教育实习的方式，彰显着教育实习价值。当前我国很多教育实习项目面临课程内容模糊、实习基地不足及教师指导不力等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应明晰教育实习在增进师范生专业理解、建构学习共同体、增强情感认同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具有的多重价值，另一方面应从实习项目设计、实习学校安排、指导教师遴选等方面，建立健全教育实习合作机制。

（武陵学刊，2026.10）